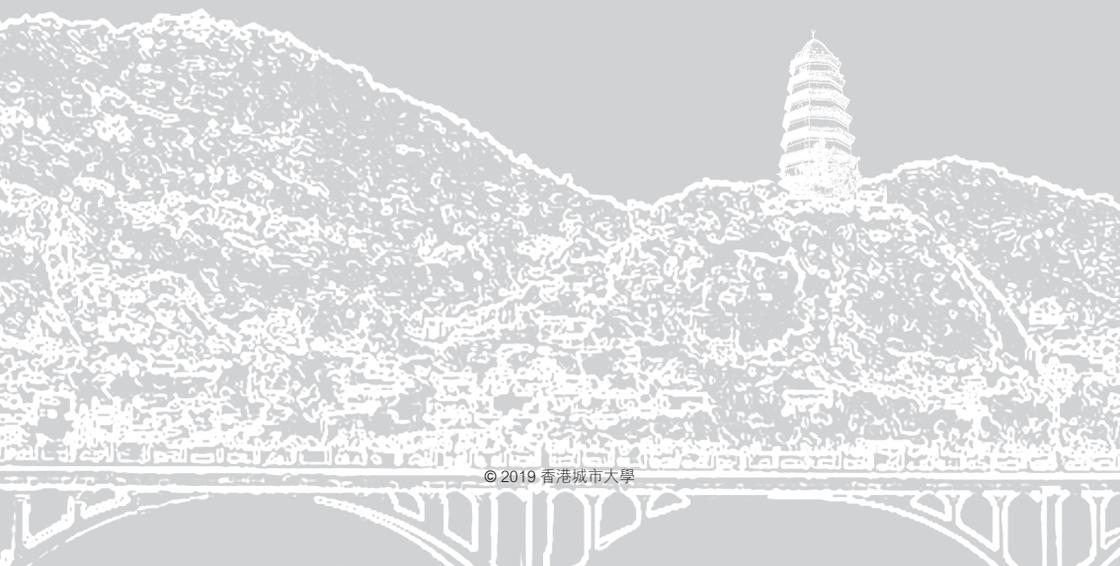


第一章

遵義會議確立了以張聞天為首 的中央集體領導

——紀念張聞天同志誕辰100周年



1935年的遵義會議上，張聞天當選黨中央總書記，此後幾年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對黨實現從國內戰爭到抗日戰爭的偉大戰略轉變做出了重大貢獻。但是長期以來，他在這個時期所起的作用卻遭到埋沒和抹殺，至今還沒有完全改正過來。今年8月30日是他的100周年誕辰，特撰此文作點辨析，以期引起討論和求得專家們的指正。

問題的提起

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後來通常說成對全黨全軍的領導），這是延安整風時定下的基調，寫進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¹從此成為歷史定論。一切黨史著作和許多老同志的回憶錄，都嚴格遵守了這一口徑。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此又加以強調和重申。²長期以來，使這個問題不只是在學術界，就是在群眾中也已成為一種常識。但是只要詳加考察，就會看出原來這一論斷並不確切，只是一種個人崇拜影響下並不合乎事實的說法。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由於強調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黨史研究在擺脫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束縛上有很大進步，對不少問題進行了撥亂反正，恢復或接近了歷史本來面目。遵義會議後黨的領導中一個關鍵性人物張聞天，過去長期受到壓制和埋沒，二十年來也得到一定研究，並獲得顯著成就。特別是張培森主編的《張聞天在1935-1938（年

* 本章原發表於《張聞天研究文集》第四集。

1 見《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 《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譜)》³的出版，為研究這段歷史提供了翔實可靠的材料，對弄清遵義會議後黨的領導問題很有幫助。但是由於以上兩個中央決議的約束和長期以來正統說法的影響，對於遵義會議後黨的領導問題許多研究仍然是只重複原有結論，即籠統肯定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而不提論據，不加分析，似乎這已是不成問題的問題，用不着再作分析和論證了。

但是由於研究的深入和更多材料的發現，原來那種籠統提法就顯得很難自圓其說。例如至今的許多黨史和傳記著作，幾乎都是在敘述了毛澤東當選政治局常委和分工做了周恩來的助手後，緊接着筆鋒一轉，就得出結論說，遵義會議「在關鍵時刻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從而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卻並不提成為領導的表現和做出這一結論的根據。把另一個常委軍事指揮上的助手說成全黨全軍的領導，實在有點牽強。即使一些有所突破的研究成果和比較客觀的著作，在這個問題上也往往自相矛盾。例如一本論述黨的六屆領袖的書《從陳獨秀到毛澤東》，確有一些獨到的見解，但卻一方面肯定「1935年1月到1937年12月，張聞天既是組織上的最高領導人，也在實際工作中起到『負總責』的作用」；⁴另一方面面用的標題卻是「一個矛盾的歷史現象——名義領袖與實際領袖的分離」，就不但讓兩個論斷相互打架，名義領袖之說還把張聞天置於掛名的總書記向忠發的地位。而且既然毛澤東在博古之後就已是實際領袖，那就只是五屆，也談不上六屆了。還有新出版的《在總書記崗位上的張聞天》，對張聞天在這段重要歷史時期的作用和貢獻，作了比較全面和客觀的介紹，但也無法擺脫這個矛盾。在一共四頁書裏就有這樣

3 《張聞天在1935-1938（年譜）》，中央黨史出版社1997年版。

4 馮建輝：《從陳獨秀到毛澤東——中共六任領袖新視面》，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88-89頁。

一些前後矛盾的斷語：先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緊接着談到項英會後的來電時又說，「這真是到了十萬火急、刻不容緩的地步，而中央最高領導人的更換問題卻還沒有解決。」等到博古交出了文件挑子，於是得出結論：「從此，張聞天開始了作為在黨內『負總的責任』的黨中央核心領導人的重要活動時期。」還補充說，「張聞天當時的思想水平、理論水平、已經達到作為黨的總負責人的要求。」⁵又如後面一節用了《擁護毛澤東的領導地位》的標題，講的內容卻是：討論是否打打鼓新場的會議上否決了毛澤東的意見，同意毛澤東作為成員之一的成立三人軍事領導小組的建議，以及會理會議上毛澤東產生對張聞天的長期誤會等，就都顯得有點文不對題。至於隨後說的，「在危難的時候，張聞天總是樂觀地對人們說：我們的黨經過艱苦曲折的過程，終於找到了正確的領導人，有了毛澤東同志的領導，我們不但能戰勝長征路上的危難，而且能夠克服今後革命路上的種種困難。」⁶這些話恐怕只能是作者的想像或延安整風後才有的提法，當時大約是不可能發生的。該書既然肯定遵義會議已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那還談什麼張聞天「負總責」和「在總書記崗位上」。博古的總書記本來是完全有職有權的，遵義會議對這個崗位的權限也沒有做出特別決定，甚至連暗示都沒有，為什麼張聞天一接手就變成了掛名的虛位？

應該說，上面提到的這兩本書還是近年來所看到的對張聞天寫得比較客觀、公正、也許更接近實際一些的。它們尚且如此，其他一些相差甚遠的書就不用說了。看來，堅守長期以來的這個固定論斷，既成了陷於矛盾而無法解決的死結，大概也是難以通過的關口，就是說：都得這樣寫。

5 李濤：《在總書記崗位上的張聞天》，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52-55頁。

6 李濤：《在總書記崗位上的張聞天》，第71頁。

由此可見，關於遵義會議後黨的領導問題還應該進一步展開討論，解決各種疑難，恢復歷史真相。其實，現在資料已相當豐富，研究成果也出了很多，問題並不難解決。關鍵只在於要不要繼續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和如何對待已有的結論（包括各種決議、權威言論以至當事人的反省和各種回憶），是採取「兩個凡是」的態度呢，還是要「不惟上，不惟書，只惟實」。如果只能以中央決議和當事人的反省或回憶為準，那1959年廬山會議的案子永遠也翻不成，更不用說「文化大革命」了，黨提出的思想路線也成了一紙空文，實事求是只不過是並不兌現的口頭禪。

實際上，根據現有材料，大概已經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遵義會議並沒有確立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確立的是以張聞天為首的黨中央的集體領導。遵義會議及其以後一個時期，毛澤東作為這一集體的一員起了重要作用，但並未成為核心。確立起毛澤東在中央和黨內的領導地位，起碼也是三四年以後的事，遵義會議連開始過渡都談不上。會上，只是經張聞天和王稼祥提議，毛澤東當選為政治局常委，從此進入了黨的領導核心。但是由於他並未代替博古任總書記（負總責），所以首先在組織上就不能算在新領導集體中為首和成為核心。如果會議情況確實像後來人們所說的那樣，大家都擁護毛澤東出來領導，那為什麼不推舉他接任總書記，反而推舉張聞天呢？有一種說法也值得懷疑，即：周恩來在發言中「全力推舉毛澤東同志為我黨我軍領袖」。「他的發言和倡議得到了與會絕大多數同志的積極支持。」⁷如果屬實，那會議起碼也會推舉毛澤東代替周恩來任軍委書記，而不是分工只做助手；成立三人軍事小組時也會以他為組長，而不會是周恩來。既然連國際顧問都可以讓其靠邊，總書記都可以更換，改變軍事領導首長是更不會有什麼困難的，周恩來本人也一定會力辭。然而這一切卻都並未出現，可見長期以來流傳的那些說法是多麼不可靠。

7 《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7頁。

既然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於理於法都顯得缺乏根據，那改為「實際上」確立了行不行呢？如果實事求是的話，應該說「實際上」也並未確立。

下面就利用二十年來黨史界研究的成果，以現有的文獻和史料作些辨析。

關於對全軍的領導

遵義會議沒有也不可能確立毛澤東對全體紅軍的領導，這是無可爭議的。因為會後一個相當時期，紅軍都處於極端分散的狀態，無論毛澤東還是黨中央都談不上對全國紅軍的領導。四方面軍在北上到達陝北會師前就一直不服從指揮。二、六軍團有八個月反而受張國燾節制。中央蘇區留守的紅軍不久就同中央失掉聯繫。長征到達哈達鋪，中央才了解到陝北紅軍活動的情況。可見，說確立對全軍的領導本來就是一句空話。

那麼能否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中央紅軍（一方面軍）的領導呢？大概也不能這樣說。會議決定和常委分工都規定得很明確，就是「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⁸ 還應特別指出的是，鑒於以前博古（實為李德）取消軍委集體領導和實行個人包辦的惡劣作風，會議強調加強政治局對軍委的領導，所以會後幾乎每天都要開政治局或常委的擴大會，討論作戰計劃和行軍路線，然後以軍事首長朱（德）周（恩

8 《遵義會議文獻》，第42頁。

來)的命令行之。作為毛澤東自稱「得意之筆」的四渡赤水，也必須變成朱周的命令才能實現。毛澤東這時只能作為會議的一個參加者發表自己的意見，而且他的意見也不見得大家都聽。例如擔任黨中央總書記的張聞天，由於對當時的軍事指揮不大信任，遂提議並經政治局會議討論決定毛澤東任前敵總指揮，也是以中革軍委朱(德)周(恩來)王(稼祥)的命令行之：「委託朱德同志為前敵司令員，毛澤東同志為前敵政治委員」，還明確周恩來仍是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⁹幾天後在討論是否打打鼓新場的鴨溪會議上，竟然以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否決了毛澤東的意見並撤消了他的政委職務。¹⁰毛澤東也只能連夜去找周恩來，建議晚點下命令。當時那種軍事上的集體領導，現在看來好像有點矯枉過正，但在沒有建立起軍事領導權威的情況下還是需要的，否則毛澤東就很難發揮作用。所以半年後的沙窩政治局常委會上，毛澤東還提議要發揮常委會作用，每週至少開會一次。¹¹說明他並不嫌開會多。因為這時毛澤東的領導威信還不是後來人們所說的那麼高。鴨溪會議上意見遭多數否決，以及會理會議前林彪寫信、彭德懷發牢騷以及劉少奇與楊尚昆發電報等不信任毛澤東軍事指揮的事件，都是證明。在個人權威還不足以保證自己主張得以實現的情況下，一般都會強調集體領導，主張多開會；一旦成為權威，才往往容易感到會多了麻煩。

有些人把成立三人軍事領導小組看作確立毛澤東軍事領導的證據，也是不大可靠的。因為三人小組隸屬於中央軍委，不但職權同遵義會議前的三人團不同，而且組長還是任軍委書記的周恩來，毛澤東

9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273頁；〈長征史概述〉、〈第一方面軍長征史〉，《長征大事典》（上卷），貴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

10 《張聞天在1935-1938（年譜）》，第9、24頁。

11 《張聞天在1935-1938（年譜）》，第9、24頁。

只是組員之一。¹²在一、四方面軍會合的兩河口會議上，代表軍委作報告和結論的就是周恩來。¹³沙窩會議決定恢復一方面軍，還是任命周恩來為司令員兼政委。¹⁴所以正如有的黨史研究者所講，從黎平會議到毛爾蓋(沙窩)會議這8個月期間，「不管是從職位上看，還是從實際作用上看，周恩來都是全軍的最高統帥」(見《中共黨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63頁)。毛澤東開始走上中央紅軍的最高領導地位，是在最後一次沙窩會議上，因周恩來生病，張聞天提議常委分工由毛澤東負責軍事以後，特別是俄界會議決定將北上紅軍改編為陝甘支隊毛澤東出任政委以後。張聞天在1943年的《反省筆記》¹⁵中也說，「出了草地以後，三人團實際上已不存在(恩來病了)，一切行動全權由毛澤東同志負責。他領導全軍打出了臘子口難關，到達了甘南的漢人區域。」實際上，直到長征結束中央抵達陝北，在下寺灣政治局會議上，又是張聞天建議，成立新的中央軍委(名義為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以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為副主席，這才正式確立了毛澤東對一方面軍(還有十五軍團)的領導。但由於張國燾鬧獨立，尚未同二、四方面軍會合，有些紅軍又失掉聯繫，所以還遠談不上對全軍的領導。

遵義會議過了將近兩年，紅軍三大主力會師陝北，中革軍委進行了改組，以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張國燾為副主席。這時雖然實際上已經實現了統一指揮，但領導關係在公眾印象中還不夠明確，有些責任還分不清，致使1937年3月西路軍的完全失敗，責任在中央軍委還是張國燾，就長期說法不一。明確和穩定地確立起毛澤東對全軍的領導，還是在抗日戰爭爆發後的洛川會議上。從此，毛澤東無論名義

12 《周恩來傳》(一)，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350頁。

13 《周恩來傳》(一)，第354-356、359頁。

14 《周恩來傳》(一)，第354-356、359頁。

15 此乃原件標題，日期署為1943年12月16日；1986年《遵義會議文獻》摘錄發表時改稱《延安整風筆記》，此後即被通稱為《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

上還是實際上，都是中央軍委主席和軍隊的最高統帥，直到四十年後去世。但還不能說洛川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的領導，這又是一年多以後的事了。

關於對全黨的領導

為什麼不能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的領導呢？下面就試舉八條論據進行討論。

會議推舉出的總書記¹⁶是張聞天

遵義會議沒有選舉毛澤東代替博古，出任總書記，是因為當時並不具備這樣的條件。毛澤東由於創建紅軍和蘇區，所以名氣很大，與朱德並列，以「朱毛」著稱，國內外以至蘇區軍民多把他看作紅軍和共產黨的領袖，知道向忠發和李立三、王明、博古、張聞天的反倒很少。這也是蘇聯和共產國際重視毛澤東，使「左」傾中央對他不能為所欲為的一個重要原因。但他在黨內的地位卻一直不高，六屆四中全會後還受到「左」傾中央的壓制和排擠，五中全會上才從政治局候補委員升為正式委員，地位仍在會議選出的中央書記（即政治局常委）博

16 關於總書記問題擬另外討論。這裏先提出以下幾點初步看法：第一，張聞天遵義會議後任總書記恐無問題，因為包括毛澤東在內許多中央領導人和老同志一直都是這樣稱呼，張自己在《反省筆記》中也多次提到出讓總書記的問題，連劉英1937年去蘇聯治病也是用總書記夫人身份；第二，張任總書記是遵義會議上大家的推舉，因他一再謙辭，才拖延到後來行軍路上交接，這與會後常委分工以毛澤東為周恩來軍事指揮助手不同；第三，六屆五中全會設書記處當是事實，因為會後不久就不斷以書記處名義發指示和向國際報告，長征中和到陝北後仍然如此。因此，陳雲多年後說遵義會議以前和以後中央都沒設書記處或常委顯然是記憶的錯誤。

古、張聞天、周恩來、項英之下，且沒什麼實權。毫無疑問，當時反對「左」傾中央和「左」傾軍事路線的靈魂是毛澤東。但是他在中央勢孤力單，掀不起一場有望解決問題的鬥爭，只能長時間保持沉默。所以張聞天、王稼祥從「左」傾中央分化出來極為重要。但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仍然站不到最前面的位置上來，只能推舉在中央位居第二的張聞天，在遵義會議上代表正確路線方面作「反報告」。這也使會議推舉張聞天起草決議並取代博古出任總書記，成為順理成章和很自然的事。

遵義會議沒有推舉毛澤東出任總書記，有的說是出於毛澤東的謙辭。這自然是沒有根據的推測。因為毛澤東自己就常說，「我是不讓權的」，「一朝權在手，就把令來行」。他還有一句著名的話，就是：「什麼偉大的謙虛，在原則問題上，從來沒有客氣過。」¹⁷何況當時的情況完全不同於六屆六中全會他已實際上成為全黨全軍領袖以後，革命又處於危機關頭，謙讓就是推卸責任。例如會後張聞天提議讓他出任前敵總指揮，毛澤東就沒有推辭。還有比較流行的一種說法是，先讓張聞天「過渡」一下，是為了好向國際交代。這也是實在說不過去的。遵義會議既然敢於把國際派來的顧問和國際批准並一直承認的總書記拉下馬，為什麼對民主選舉替代的人就這麼多顧慮呢？而且此說至今並無任何足可證明的材料，甚至包括一些人的回憶錄都沒提到當時的什麼人曾有此考慮。相反地，中央領導人倒是知道過去國際是支持毛澤東而不支持張聞天的。例如六屆五中全會選張聞天為書記之一，國際回電就不同意，後經博古去電解釋才予批准。¹⁸而「左」傾中央會前還計劃取消毛澤東的政治局候補委員，國際不但不准，還力主把他選為正式委員。對於去掉毛澤東的人民委員會主席，換成張聞

17 轉引自馮建輝：《從陳獨秀到毛澤東》，第92頁。

18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